

# 救亡图存与民生维艰：抗战时期滇西难民救助的多维审视（1937-1945）

郭秀

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，云南芒市，678400；

**摘要：**抗战时期，云南滇西地区作为中国西南门户，承担了重要的战略任务，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战争压力和社会重构。由于战争、社会经济结构破坏、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，滇西地区难民数量剧增，社会经济秩序陷入混乱。地方政府、社会组织、国际社会和外国政府等采取了多种措施开展难民救助工作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难民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，并为边疆难民救助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新途径，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的生存问题。

**关键词：**抗战时期；滇西地区；难民；救助

**DOI：**10.69979/3029-2700.25.04.056

## 1 抗战时期滇西地区难民概况

抗战时期，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和国内防线的收缩，尤其是国民政府西迁，大量难民被迫西迁。滇西地区难民问题尤为突出，据史料记载，滇西难民主要来源于战区内迁、日军对云南的空袭以及滇西沦陷所产生的本籍难民。从籍贯看，滇西地区的外籍难民主要来自战区，抗战初期，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江苏等地的难民人数相对较多，南京、湖北、河北等地次之，其他省份较少。例如，云南省赈济会 1939 年（民国二十八年）度对难民籍贯的统计中，清晰体现了这一分布特点。豫湘桂战役爆发后，粤籍难民人数骤增，外籍难民籍贯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，但总体上仍以战区难民为主。随着战争的推进，滇西本籍难民因日军的空袭和滇西的沦陷，人数不断增加，到后来本籍难民人数远超外籍难民人数。这些难民中，青壮年占比较高，男性多于女性，且多数难民缺乏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，急需社会救济。

## 2 滇西地区难民产生的根源

### 2.1 战争的直接影响

卢沟桥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，不断从东北、华北等地持续侵略，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，迫使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武汉，再从武汉迁至重庆。云南的战略地位随之提升，大量国际援助物资只能通过缅甸经滇西供应。滇西地处中国西南边陲，东临四川，南接缅甸，是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通道，也是日军进攻中国内地的重要通道之一。控制滇西对于保卫中国西南地

区的稳定和安全至关重要。因此，滇西地区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和伤亡，在日军的不断侵略下，社会动荡和人口流离加剧，大量居民被迫离开家园，成为难民。日军占领芒市后，龙陵人遥望芒市大火，开始逃亡，“难民、华侨、散兵或步行，或乘车，争先恐后向保山方向逃难。啼哭呼号之声不绝于耳。”<sup>[1]</sup>关于难民数量的统计，因缺乏科学的数据支撑，学界长期以来没有达成共识。据陈达统计，“七七事变”后短短数年中，全国城乡共有 1425 万人迁往后方；陈彩章认为大后方除有组织的迁移人口外，仅难民就收容了 1 千余万人；而陆仰渊认为迁移人口多达 5 千万<sup>[2]</sup>；孙艳魁更认为总数当在 6000 万人，占当时中国 4.5 亿人口的 15% 以上<sup>[3]</sup>。总之，因受战争的影响，全国难民数量巨大，不下千万。

### 2.2 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破坏

滇西地区在抗战前主要以农业为主，手工业和商业相对落后。抗战爆发后，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东部和中部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，切断了滇西与内地的经济联系。滇西地区原本依赖内地供应的物资和商品变得极度匮乏，物价飞涨，经济陷入困境。据《云南省志》记载，1937 年抗战爆发后，滇西地区的物价指数在短短两年内上涨了数倍。粮食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飙升，普通民众难以承受。1941 年 12 月云南的民国日报内容：

“上等白米（每公石）国币 230 元，中等白米（每公石）210 元，次等白米（每公石）280 元”<sup>[4]</sup>。可见昆明地区大米价格已经是 1939 年 11 月的 4 倍还多。同时，日军

对滇西地区的轰炸和破坏,使得农田、房屋、道路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,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。据统计,1940年至1942年间,滇西地区的粮食产量下降了约30%,导致大量农民失去生计,被迫逃离家园,成为难民。

随着战争的持续,滇西地区成为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,大量军队、政府机关、学校和企业迁入该地区。然而,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并未带来经济的繁荣,反而加剧了资源的紧张和社会的不稳定。滇西地区原本人口稀少,基础设施薄弱,难以承受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涌入。除了昆明地区涌入大量外地人员外,滇西的大理也是难民的安身选择之地,“大理为滇西过往军人及物资的中转站,难民纷纷涌入,乞丐和孤儿,散兵成群结队,社会秩序混乱”<sup>[5]</sup>。《滇西抗战史料汇编》记载,1942年至1945年间,滇西地区的人口增加了约50万,其中大部分是难民和迁入的军队、政府人员。这些人口的涌入使得原本就紧张的粮食、住房等资源更加匮乏,社会矛盾日益尖锐,严重冲击了地区社会资源的配置和供给。大量难民为了生存,不得不四处流亡,形成了大规模的难民潮。

社会经济结构的破坏和人口的大量流动,直接导致了滇西地区社会秩序混乱。大量难民为了生存,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获取资源,偷盗、抢劫等犯罪行为频发。同时,由于政府机构迁入和大量军队驻扎,滇西地区的行政管理体系陷入了混乱,难以有效维持社会秩序。据《滇西抗战时期的治安状况》记载,1943年滇西地区的犯罪率比战前上升了约200%,其中大部分案件与难民有关。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维持秩序,但由于资源有限,效果并不明显。社会秩序的混乱进一步加剧了难民的困境,许多人被迫再次流亡,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
基于以上原因,滇西地区的难民数量随着抗战的加剧在不断扩大。《云南省抗战时期难民统计》数据显示,1937年滇西地区的难民数量约为10万人,而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,这一数字已上升至50万人以上。这些难民中,既有本地因战争失去家园的农民,也有从东部和中部逃难而来的百姓。难民的增加不仅给滇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,也使得该地区的文化、教育、卫生等社会事业受到严重冲击。难民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,许多人因饥饿、疾病而死亡,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。

## 2.3 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恶化

抗战时期滇西地区自然灾害不断,多为水灾、旱灾和地震,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破坏。滇西

地区地处横断山脉,河流纵横,雨季时极易发生洪涝灾害,而旱季则常常面临严重的干旱。滇西位于地震活跃带,地震灾害时有发生。根据《云南省志·自然灾害卷》记载,1937年至1945年间,滇西地区共发生了20余次较大的水灾和旱灾,尤其是1941年和1943年的特大洪灾,导致澜沧江、怒江流域的大片农田被淹,房屋倒塌,数万人无家可归。这些自然灾害不仅直接破坏了居民的生活环境,还导致粮食减产甚至绝收,进一步加剧了难民的产生。据统计,1941年至1943年间,滇西地区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减产幅度高达40%以上,许多农民因无法维持生计而被迫逃离家园,成为难民。

滇西地区的生态环境因战争和人为活动而急剧恶化。首先,为了支援抗战,滇西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和矿产资源开采,以满足军事和工业需求。大规模的砍伐导致水土流失加剧,甚至连河道边的树木也被砍伐,导致河道塌方,土地荒漠化加剧。其次,战争期间,滇西地区作为重要的战略后方,大量军队和难民的涌入,使得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了更大的压力。《滇西抗战时期生态环境调查报告》记载,1937年至1945年间,滇西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战前的40%下降至25%左右。水土流失导致农田肥力下降,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。此外,由于战争需要,滇西地区的矿产资源被过度开采,导致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发,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。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使得农业生产难以为继,还导致了許多地区的饮用水源受到污染,居民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。许多村庄因环境恶化而无法居住,村民不得不背井离乡,成为难民。随着战争的持续,滇西地区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,直接导致了滇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崩溃和难民数量的激增,粮食供应严重不足,物价飞涨;许多地区居住条件变得极为恶劣,不适合居住,不得不逃离家园,寻找新的生存空间。

## 3 滇西地区难民的救助工作

面临滇西地区大量的难民,国民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逐步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救助政策。1937年,国民政府成立了“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”,统筹全国难民救助工作;1938年设立“中央赈济委员会”开始在武汉办公,随之出台了多个救济规章制度;1939年先后成立省级赈济委员会23个,市县各级1143个<sup>[6]</sup>。滇西地区作为抗战大后方,难民问题尤为突出,因此成为政府救助的重点区域之一。《云南省志·民政卷》记载,

1938年,云南省政府成立了“滇西难民救济总会”,负责协调各地的难民救助工作。1942年5月1日下关分站成立开始办公,1943年7月1日保山分站建成,形成了覆盖滇西主要地区的救助网络。由昆明总站、省民政厅、赈济会共同草拟了《救济腾龙战区难民实施办法》,指导滇西难民救助工作。

### 3.1 政府的救助措施

一是实施难民收容与安置。国民政府设立了大量的难民收容所和临时安置点,为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。1937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了《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》,明确规定了难民收容建立的办法;1942年8月19日又颁布了《修正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》,规定:“凡战事发生地点,赈济委员会应派员会同省市县政府及驻军,办理抢救事宜,但战事剧烈地点,赈济委员会不能前往工作时,得委托军队相机办理。”<sup>[7]</sup>明确了地方政府和当地驻军具有救济难民的义务和责任。《滇西抗战时期救济工作报告》统计,1938年至1945年间,滇西地区共设立了超过100个难民收容所,收容难民总数达20余万人。这些收容所主要分布在保山、大理、丽江等相对安全的地区,为难民提供临时住所、食物和基本医疗。

二是多方筹措粮食供应与救济。粮食短缺是难民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。云南地区随着抗战的持续,尤其是大量难民迁入,粮食极度紧张。政府通过调拨粮食、发放救济粮等方式,试图缓解难民的饥饿问题。《云南省粮食局档案》记载,1940年至1945年间,滇西地区共发放救济粮约50万石,受益难民超过30万人。此外,政府还鼓励当地居民和富户捐粮捐物,支持难民救助工作。

三是医疗救助与防疫。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疾病流行,难民的健康状况堪忧,政府在难民收容所设立了临时医疗站,为难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。日军还投放了细菌弹,致使滇西地区霍乱和鼠疫横行蔓延,李根源为揭露日军惨无人道的“细菌战”写道:“兽机肆虐之后三日,城乡各处发现霍乱。”鉴于滇西地区霍乱流行,前线指挥官宋希濂将军与李根源老先生立即采取了措施,“令部队在所有的村庄里为居民进行环境的扫除和隔离工作,派出大部分军医人员为居民注射防疫针。”

<sup>[8]</sup>《滇西抗战时期卫生工作报告》记载,1942年至1945年间,滇西地区共接种疫苗超过10万人次,有效控制

了霍乱、疟疾等传染病的传播。

### 3.2 社会组织的参与

一是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救援。中国红十字会是抗战时期滇西地区难民救助的重要力量之一。红十字会以其国际性和中立性,在战争环境中能够相对自由地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。云南红十字会成立于1914年,发展到1924年分别设立昭通分会和昆明分会,后来又成立了大理分会。1942年,滇西战役爆发后,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在保山、大理、腾冲等地设立了临时医院和救助站,为难民提供医疗服务和物资援助。根据《中国红十字会滇西抗战救援报告》记载,1942年至1945年间,红十字会在滇西地区共设立了15所临时医院,收治伤病难民超过5万人次。此外,红十字会还组织了多支医疗队,深入难民营和乡村,为难民提供疫苗接种、疾病治疗和卫生教育。例如,1943年,红十字会在保山地区开展的霍乱疫苗接种行动,成功遏制了疫情的蔓延,挽救了数千难民的生命。除了政府外,许多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也积极参与到难民救助工作中,为难民提供食物、衣物和医疗服务。

二是慈善团体的积极行动。抗战期间,许多慈善团体也积极参与滇西地区的难民救助工作。这些团体包括本地的慈善会、外地的救济组织以及海外华侨团体等。他们通过募捐、物资调配和直接救助等方式,为难民提供了重要支持。1943年,由海外华侨组成的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向滇西地区捐赠了大量粮食、药品和衣物。《滇西抗战时期慈善团体工作报告》统计,1942年至1945年间,滇西地区共接收慈善团体捐赠的粮食约20万斤,药品价值超过50万元。这些物资通过各地的慈善会分发到难民手中,缓解了他们的生存压力。此外,本地的慈善团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例如,保山地区的“滇西慈善会”在1942年滇西战役后,迅速组织了一支志愿者队伍,为难民提供食物、饮水和临时住所。据统计,该慈善会在1942年至1945年间,共救助难民超过2万人。

三是教会组织的慈善救助。滇西地区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教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,抗战期间,教会组织积极参与难民救助工作。中华基督教徒联合会难童教养院,是中华基督教徒联合会云南分会组织建立的,主要负责:教养因战而失养之儿童,以相当之训练,儿童于精神上智力上加劳力体力上均发展成健全之国民<sup>[9]</sup>。教会利



用其广泛的网络和资源,为难民提供食物、衣物、医疗和临时住所。例如,天主教昆明教区在滇西地区设立了多个难民收容所,收容了数千名无家可归的难民。《滇西抗战时期教会救助档案》记载,1942 年至 1945 年间,滇西地区的教会组织共发放救济粮约 10 万斤,衣物 2 万余件,为难民提供了重要的生活保障。此外,教会还开设了临时学校,为难民儿童提供教育服务。例如,大理地区的天主教会开设了一所难民学校,收容了 200 多名儿童,为他们提供基础教育和心理辅导。

### 3.3 国际援助的作用

一是联合国的前身——国际联盟的援助。虽然国际联盟在二战期间影响力有限,但其下属的卫生组织和难民机构仍为滇西地区提供了一定的援助。1943 年,国际联盟通过其卫生组织向滇西地区捐赠了一批药品和医疗设备,用于支持当地的防疫工作。此外,国际联盟还通过其难民机构,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滇西地区的难民问题,推动了更多援助资源的流入。

二是各外国政府的救助工作。美国、英国作为中国抗战的重要盟友,在滇西地区的难民救助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942 年,美国政府通过“租借法案”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,其中一部分被用于滇西地区的难民救助。根据《美国对华援助档案》记载,1942 年至 1945 年间,美国向滇西地区提供了超过 500 吨的粮食、药品和衣物,并通过飞虎队的运输机将这些物资运送到滇西各地。英国政府通过其驻华机构和慈善团体,为滇西地区的难民救助提供了支持。1942 年,英国红十字会向滇西地区捐赠了一批医疗物资和食品,并通过滇缅公路将这些物资运送到难民手中。还通过其驻昆明领事馆,协调当地教会组织和慈善团体,为难民提供临时住所和基本生活保障。部分海外华侨积极组织捐款、捐物的救援行动,为滇西地区的难民提供了大量支持。根据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工作报告》记载,1942 年至 1945 年间,该组织共向滇西地区提供了价值超过 500 万元的援助物资,包括粮食、药品、衣物和建筑材料。

### 4 结论

抗战时期,国际社会的救助为滇西地区的难民提供了重要支持。抗战时期,滇西地区难民的救助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。政府通过设立收容所、发放救济

粮、提供医疗救助和生产自救等措施,试图缓解难民危机。然而,受战争环境和资源限制,救助工作的效果有限,难民的生存状况依然严峻。这一历史经验提醒我们,在面对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时,政府和社会需要更加高效地协调资源,采取综合措施,才能有效应对挑战,保障难民的基本生存权利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、外国政府和海外华侨团体的共同努力,缓解了难民的生活困境,挽救了无数生命。然而,受限于战争环境和资源条件,国际救助的效果也面临诸多挑战。这一历史经验表明,在面对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时,国际社会的协同合作至关重要。只有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努力,才能更有效地应对难民问题,保障难民的基本生存权利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王正乾:《滇西历难》,中国铁路文艺,2005 年第 8 期。
- [2]陈达:《现代中国人口》,中华书局 1981 年版,第 46 页。
- [3]陆仰渊等编著:《民国社会经济史》,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,第 636 页。
- [4]孙艳魁:《苦难的人流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,第 48 页。
- [5]《经济简报》,民国日报,1941 年 12 月 6 日。
- [6]大理市志编辑委员会:《大理市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8 年,第 728 页。
- [7]吴捷: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济与安置难民活动述论》,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05 年。
- [8]陆卫先,杨文虎主编:《永昌府文征(第三册文录——为保山惨变乞赈通电)》,昆明:云南美术出版社,2001 年,第 3086 页。
- [9]云南省档案馆藏:云南民国政府档案,社会处,全宗号 44,目录号 4,案卷号 144。
- [10]宋希濂:《鹰犬将军》,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1986 年,第 158 页。

基金项目: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2021 年,“民国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研究”成果,编号:2021 J1170。

作者简介:郭秀,(1985 年—)女,陕西咸阳人,硕士研究生,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学院讲师,研究方向:中国近代云南地方史。